

人民日報學術文庫

五代十國時期 南方士人羣體研究

祁開龍◎著

人民日報
出版社

人民日报学术文库

五代十国时期 南方士人群体研究

祁开龙◎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士人群体研究 / 祁开龙著. —北

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 - 7 - 5115 - 3210 - 7

I. ①五… II. ①祁… III. ①士—研究—中国—五代
十国时期 IV. ①D69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1788 号

书 名: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士人群体研究

著 者: 祁开龙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袁兆英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3105

网 址: [www. peopledaily. press. com](http://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5. 5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5 - 3210 - 7

定 价: 68. 00 元

序

祁开龙同志大作告成，嘱我作序，我作为他的导师，指导过他的学业并目睹他的成长，今又见其大作付梓，不胜感慨，甚为欣慰，故当为其作序。关于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迁及其对南方士风的影响，是我深感兴趣且十分熟悉的一个学术问题，多年前就撰写和发表了研究专文，今天借此机会，先对该问题作简要论述如下，权作引文。

唐朝末年，社会政治矛盾十分复杂，中央朝官与宦官的矛盾、宦官与藩镇的矛盾，以及藩镇之间的互相攻打兼并，这些矛盾斗争交织在一起，使唐末的形势极为混乱。最后，宣武镇节度使朱全忠先后打败了河南藩镇秦宗权、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等强藩，从一个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发展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藩镇节度使。唐天复三年（903年），朱全忠打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进京杀宦官第五可范以下数百人，完全控制了唐王朝。朱全忠在篡唐的过程中，为了扫清障碍，曾制造了“白马驿惨案”，杀宰相裴枢、崔远等朝官三十余人，并投尸于黄河。唐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废唐哀帝李祝，唐王朝灭亡。

五代十国是唐后期藩镇割据的继续与发展，中原地区经历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的更迭，而南方诸国则是同时并存，五代十国的开国之君多是前朝的方镇，靠军事割据发展起来的。因而总体上看，武力割据，战争频仍，政权更迭，成为这一时期政治的显著特点。但是，这一时期北方五代王朝与南方诸割据政权在治国理念上却有较大的差异。五代王朝，武人当政，藩镇跋扈，以骑马弛射博弈为荣，他们轻视文人，任情杀戮，因此战乱不断，直至后周时期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而当时偏安一隅的南方诸国，为了能在乱世中立足，都采取比较积极务实的轻徭薄

赋与保境息民政策,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同时,南方各国统治者基本上都能崇文尚士,设立诸如延宾亭之类的机构,以招徕四方之士,并注重发展教育,复兴文化事业。当时南方的社会环境较之北方安定,自然也就成为那些避难者的乐土。

唐宋以前,我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在中原,历史上中原地区灿烂的文化和物质文明造就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士人,他们以相对良好的政治文化素质而普遍得到南方各政权统治者的青睐和礼用。因此,唐末五代时朝许多北方士人或是逃避战乱,或是躲避祸害,或为谋取仕途,而纷纷南下,他们奔走于南方各国之间,谋求进身之机会,他们与南方士人共同构成南方的士人群体。

当时北方士人南下的主要流向是江淮地区的吴、南唐,西蜀地区的前后蜀,闽广地区的闽国、南汉。这些南迁士人中颇负名望者如:流寓吴、南唐的李俨、严可求、徐玠、张延翰、常梦锡、张易、魏岑、孙晟、韩熙载、史虚白、潘佑等;流寓西蜀的韦庄、张格、张道古、卢延让、毛文锡、王仁裕、王处回、毋昭裔、李昊等;流寓闽和南汉的韩偓、杨沂丰、赵光裔、杨洞潜、李殷衡、刘濬等。此外,还有一些原籍南方的北方士人也纷纷南迁,如徐仲雅、章鲁封、罗隐、梁震、孙光宪、江文蔚、高越、黄滔、徐寅、翁承赞等。

北方士人南迁后,普遍受到南方诸国统治者的重用,被委以重任,官至中书门下(宰相)、太傅、枢密使、翰林学士以及中书侍郎、门下侍郎等高级官员者比比皆是。他们与南方本土士人一起,协助南方诸国政权制定立国制度、礼仪刑法、政策号令、发展文教,对南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教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大量北方士人的南迁和融入南方社会,为南方社会注入新鲜血液,也改变了南方士人队伍的结构。与此同时,汉唐以来,北方士人勤奋治学的学风、积极进取的精神、政治参与的意识,以及在南方社会优越的物质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系列有别于传统士风的生活新风尚,无不深刻地影响着整整一代的南方士风。五代十国时朝,南方士风的变化,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说对整个封建社会后期的南方士风都得到持续性的影响,以至宋代以后南方地区文教发达,科举兴盛,人才辈出,文化重心彻底转向南方。

上述唐末五代时期北方士人南迁及其对南方士风的影响,的确是唐宋史一个颇为重要的学术问题,因而也引起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单篇的论文间有所见,在相关的论著中对该问题也都有所论述。但是,全面、系统和深入研究并撰写成专

著者,祁开龙同志当之无愧是第一人。祁开龙曾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当年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他就对该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大量搜集和阅读有关文献资料。由于他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和认真扎实的治学态度,终于在三年的学习生涯中完成了近十万言的硕士论文《五代南方士风的变化》。此后,开龙君又考取博士学位研究生,得到进一步的深造,学业大有长进,如今他供职于福建工程学院,从事历史文献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近来,开龙君又在其硕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修改与增补,终于完成近二十万言的专著《五代南方士人群体研究》。该专著无论在资料上,还是在理论上,较之前文均提升了一个层次。综观全文,我认为该专著至少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作者搜集、引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凡举正史、杂史、政书、类书、笔记小说、诗文集、地方志等均多所利用,作者力图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系统而详细地论述唐末五代这一较为复杂的历史现象。比如,作者在书中所例举和介绍的南迁士人,在有关的论著中最为详尽,因而为全面分析唐末五代这一历史现象奠定了基础。其二,理论水平较高,观点正确且有创意。比如,对南迁士人对南方士风影响的分析和评价是比较恰当的。书中例举诸如韩熙载、孙晟、李昊、欧阳彬、韦庄、罗隐、王延彬等代表人物,均为南迁的北方士人,他们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其行为深刻地影响了南方的士风。此外,北方士人勤奋好学、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政治参与意识也都影响南方的一代士风。这些观点不但正确,且很有创意。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最后,我衷心希望祁开龙同志继续努力,学无止境,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戴显群

2015年5月1日于福州碧水芳洲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一、选题的意义 1	
二、学术回顾 1	
三、研究主题 5	
第一章 五代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发展	7
第一节 南方政局的初步稳定 7	
一、南方地区割据政权的概况 7	
二、保境息民政策 11	
第二节 南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16	
一、农业 16	
二、手工业 18	
三、商业 21	
第三节 南方各国文化教育的恢复与发展 23	
一、文化艺术 24	
二、南方教育 25	
第二章 五代南方士人群体的构成	30
第一节 唐末五代士人聚集南方地区的成因 31	

第二节	吴国士人群体	34
第三节	南唐士人群体	42
第四节	前蜀士人群体	64
第五节	后蜀士人群体	74
第六节	楚国士人群体	83
第七节	吴越士人群体	92
第八节	闽国士人群体	101
第九节	南汉士人群体	109
第十节	荆南士人群体	116

第三章 五代士人的时代特征 119

第一节 各个历史时期的士人阶层概况 119

- 一、先秦时期士人阶层概况 119
- 二、秦汉时期的士人阶层概况 123
-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阶层概况 126
- 四、隋唐时期士人阶层概况 128

第二节 五代南北士人的群体特征 131

- 一、五代南北士人群体构成的差异之处 131
- 二、群体特征 133

第四章 五代南方士人群体的社会风尚 138

第一节 积极进取的政治风尚 138

- 一、北方士人群体的政治风尚 138
- 二、南方士人群体的政治风尚 140

第二节 讲究物质、人情放荡的生活风尚 145

- 一、唐末五代南方士人的奢侈之风 145
- 二、唐末五代南方士人奢侈之风形成的原因 148
- 三、唐末五代南方士人奢侈之风的社会影响 150
- 四、结语 152

第三节 寓无为而有为的隐逸风尚	153
一、隐逸的时代性特征	153
二、隐逸的地域性特征	155
第四节 崇文好学之风尚	158
 第五章 五代南方士人阶层在历史上的地位	163
第一节 对于五代十国士人的再评价	163
一、对于五代士人风气沦落的再认识	163
二、五代十国士人群体的历史地位	166
第二节 五代南方士人群体在政权中的作用	168
一、制定礼仪法度,完善各项设施	169
二、悉心辅佐藩主,维持政权的延续	170
三、劝课农桑,发展生产	170
第三节 五代南方士风对宋朝的影响	171
 附录1 五代十国南方士人群体编年简表	176
 参考文献	229

绪 论

一、选题的意义

士人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阶层。他们虽然肩负文化道德传承之重任,但其生来就是一个“缺陷儿”。文化人格的独立、天生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无法弥补其在政治和经济的依附性,这就注定了中国士人阶层在现实中只能作为政治附庸,而在文化心理上充当“精英”的尴尬地位。说到底,士人阶层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需要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需要相当的环境和际遇才能施展其才华和抱负。而在五代乱世中,士人遭遇了时代的不幸。他们在社会环境变化的强力冲击下,信仰、理念经历了怀疑,发生了动摇;五代南方士人在这种大背景下,也某种程度表现出这种趋向。但当时南方社会经济文化相对稳定,各政权统治者为巩固割据政权,也都积极招徕士人,礼遇士人,士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因此,南方士人群体的心态比较积极,或积极投身于政治中,为当权者出谋划策;或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对传播文化,推动当地文化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在这个特殊的转型时代和文化地域的双重背景下,剖析社会主导群体之一的士人群体的演变及其相应轨迹,自有特殊意义。而群体研究的方法则可以剖析社会问题,把握时代脉搏,聆听历史真相。在展现五代南方整个士人阶层风貌的同时,展现由社会风气、人文精神及环境要素等组成的社会历史画卷。

二、学术回顾

中国古代的士人主要是指封建社会中的读书人,他们又被称为士、士大夫、士

绅等。他们在儒家正统思想的指导下,进修德业,走“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士人扮演的角色是文化知识的传承者和道德礼教的代言人。他们是封建社会的精英阶层,是社会文化及精神性活动的主导力量,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在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学界对士人的研究成果丰硕,并且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研究者给予了多角度的关注,从传统到现代,从思想到行为,从个案到群体,进行了大量的理性思考与分析。下面分两部分做一简单介绍:

近人关于中国士人的研究。钱穆先生和他的学生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余英时先生都对士人有过专门的研究。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宋代理学三书随札》中的《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等三篇专论,尤其是其中的古代部分,对士人的品格、精神及其历史作用和影响等加以评析;其后余英时先生秉承师脉,对中国士人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大作《士与中国文化》就中国士人的历史传统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性格。并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了古代士人批评政治、“抗礼诸侯”的价值系统的形成。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论》则围绕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政治思想、学术精神、传统与现代的发展脉络等方面进行考察,从文化变迁中探索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品质。此外,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分十个专题,从哲学与宗教的角度,将知识分子置于现代化的演进中,进行分析与考察。既有对21世纪知识分子前途、命运的理性探讨,也有对20世纪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回顾和评价。并提出了新观点,即“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说缺乏独立人格,这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之一,也是中国文化的缺陷之一。”刘泽华主编的《士与社会(先秦卷)》,研究了先秦时期的分类、士人的社会政治活动,士人的社会活动等;许树安的《古代选士任官制度与社会》,从选举制度入手作了有价值的研究;还有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史稿》,葛荃的《权利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王廷洽的《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董乃斌的《文化紊流中的文学与文士》等。这些专著都是对士人阶层的总体或断代的研究,虽无专门涉及五代时期的士人,但仍对笔者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关于五代士人的专门研究部分。五代是个国危、世乱、民苦的时代,其惨烈程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的叙事议论中常用“呜呼”两字开

头,可见其对五代士人和文化的失望程度。对五代学术,更直接称“五代无学术”。受此影响后人对五代人事及文化相关研究很少,往往概而论之。同时,许多学者视五代为唐末藩镇割据之余烈,有关论述或文章常常将只附在唐之后、宋之前一笔带过,浅尝辄止。尽管如此,马端临《文献通考》、王士禛《五代诗话》、徐松《登科记考》、赵翼《廿二史札记》等古代大家对五代社会文化的研究和总结对笔者的启发颇大。

当代涉及五代士人研究的专著有:郑学檬的《五代十国研究》中在宾幕入职制度、科举制度与选官制度两论中提到五代士人入幕及科举入仕的一些事迹;杜文玉的《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中对比贡举科目录取人数的变化,得出五代士人素质的下降;他的《南唐史略》中的第六章“南唐文化”介绍了南唐在文化艺术及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认为南唐文化起了承唐启宋的作用;徐晓望的《闽国史略》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闽国士人群体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认为五代是福建政治人才、文化人才开始崛起的时期,“他们的成批出现,标志着福建文化的普及及提高,从而为两宋福建文化大发展奠定基础。”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则从诗歌入手,探讨了五代作家人格的变化;而他的《五代十国文学编年》则对唐末五代作家做了较为详尽的考证,便于读者了解作家的生平事迹;邹劲风的《南唐国史》也系有关南唐历史的综合性专著,着重对南唐政权演变、政策变化、文化特征等作了深入的分析与论述,认为“由于南唐文人构成不同,其文化的平民化、文人化的倾向更为明显,一个后世所谓的文人社会在南唐显露雏形。”陈欣的《南汉国史》则客观分析了南汉士人群体对南汉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南汉士人的文化成就颇为丰富,将岭南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起到承唐启宋的作用;罗庆康的《马楚史研究》则认为马楚时期,湖南一扫隋唐文人寥若星辰的状况,涌现出大量知名文士,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黄云鹤的《唐宋下层士人研究》在唐、五代下层士人的入幕为僚一节中,分析了入幕的动机、条件、与幕主的关系及后人的评价;石云涛的《唐代幕府制度》则把五代部分入幕的士人做了简要的整理;张再林的《唐宋士风与词风研究》着重探讨了中唐至北宋时期士大夫文人的士风与词风的动态联系及衍变过程;樊文礼的《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就士大夫在五代政权特别是沙陀三王朝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比较中肯的评述;李斌城等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虽然没有专章论述,但在阶级结构、社会风俗和文化教育中论及五代士

人;程蔷、董乃斌的《唐帝国的精神文明》就民俗与文学方面论述了唐代文人士子的人格理想及时代迁易下的士风演变。此外,冯尔康的《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演变》、徐庭云的《中国社会通史·隋唐五代卷》等通论性的著作也有相关涉及和论述。

在论文方面,王凤翔的硕士论文《五代士人群体及士风研究》和《论五代士风》通过对五代士人的群体研究,得出五代士人的群体特征,并揭示了五代士人的四大风气;孙震涛的博士论文《唐末五代西蜀文人群体及文学思想研究》全面考察了唐末、前蜀、后蜀三个不同时期,西蜀文人群体的生成态势、群体性格及文学创作思想的整体演变态势;吴宝明的硕士论文《五代十国时期马楚士人与诗歌研究》对马楚政权文人群体进行了考证,分析了马楚文人的交流情况;吴德明的硕士论文《吴、南唐文职幕府研究》则分析了吴、南唐士人的入幕问题,认为这些幕府文士对巩固吴、南唐政权,推动江南地区的文学艺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朱敏楠的硕士论文《晚唐五代僧俗交游与士风考论》则关注到诗僧这以特殊群体,并分析了僧俗交往对仕途、思想方面的影响;魏良弢的《南唐士人》对南唐的士人群体进行了个体剖析,认为他们对江淮大地的社会风气,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何剑鸣的《南唐崇儒之风与江南社会的文化变迁》探析南唐崇儒的现象、原因及其影响,对于了解我国古代社会文化中心的南移进程,了解江南社会的文化变迁,具有重要意义。钟祥的《南唐诗人心态及诗风》认为南唐士人心态消极颓唐,由此而决定了他们诗歌主题的主要取向及诗风卑弱不振的趋势;任爽的《五代分合与南唐的经济文化》认为五代时期虽然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南方的经济文化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可以算是当时最大的收获;杨小敏、庄虹的《唐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变迁》对唐代知识分子即士人在唐朝兴、盛、衰等不同时期的心态变化做了分析,认为这种心态变迁对五代产生了重大影响;付满仓的《唐末朝士的心态与命运及其影响》认为唐末政治局面使朝士心态发生了剧变,并直接促成了唐朝的灭亡等等;韩国金东显的《五代文臣的动态与其性格》一文通过对文官的制度论述了其在五代政治延续中的作用;韩国金宗的《五代政局变化与文人出仕观》从五代政局变化的背景,分析了五代文人的出仕取向,认为文人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待遇,并不会因其不同的政治立场而受责难;李定广的《罗隐生平事迹辨证——兼与吴在庆先生商榷》和《遭遇历史误会的文学巨人——罗隐文学史地位之重估》属于个案研

究,《罗隐生平事迹辨证》对罗隐的生平几个转折点做了详细的考证;《遭遇历史误会的文学巨人——罗隐文学史地位之重估》则对其文学地位重新做了很高的评价;此外,还有房锐的《梁震生平事迹考》、《孙光宪郊游考》;罗琴的《杜荀鹤的身世鹤家庭》、《杜荀鹤的人生道路及品格》;陈婷的《孙光宪词研究》;周寅宾的《五代楚国士人沈彬考辩》;孙艳红的《徐锴卒年考》等都属个案研究,这些个案研究对士人的生平事迹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加大了五代士人群体研究的深度。

总之,这些论著和论文虽然从不同侧面对五代士人群体进行了研究,但五代士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心态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别,特别是五代南方士人群体,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首先,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北方地区的士人群体,对南方的关注较少。不同地域的文化风貌是不同的,不同地域的人群也是不同的。从南北士人的数量对比来看,南方士人数量要远高于北方,五代之后,中国南方地区的文化发展是与这群士人密切相关的。其次,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政治、思想和文学方面特别是诗词方面,但从历史和社会史角度,对这一时期士人群体实际社会生活的研究涉及不多。尤其是五代时期南方社会的发展变化,使南方士人群体的心态、价值观念等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构建了这一时期不同于五代北方及前代的特殊的士人风尚;第三,对南方士人的研究又多集中于南唐,集中于诗人作家,集中于个别研究。对于南方士人群体的研究寥寥无几,只有魏良《南唐士人》、孙震涛《唐末五代西蜀文人群体及文学思想研究》数篇。针对目前五代南方士人群体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笔者拟对五代南方士人尤其是士人风气方面做一试探。

三、研究主题

本文是以五代南方士人群体为研究对象,属于群体研究。本文主要研究当时南方士人群体的构成及其时代特征,以及这些士人那个特殊的时代、地域环境下,所形成的政治风尚、生活风尚、隐逸风尚及文化风尚。目标是通过对五代南方群体的具体、深入研究,揭示出一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对一个时代士人风气的影响。反之,一个时代的士人风气,又深深地影响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风气。通过对五代南方士风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把握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人文精神。另外,关注五代这一特殊社会转型期中的士人群体的命运及其风貌无疑是对这个时代的一次严肃的再审视,对今日知识分子的反省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定位不无裨益。

本书涉及两方面的工作:首先,对史料的甄别工作。前面我们提到五代是“季世”,对于五代的研究历来很少,所以可用史料有限,主要有正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杂史《十国春秋》、《九国志》、《五国故事》,笔记《容斋随笔》、《北梦琐言》、《清异录》、《玉壶清话》等。其中,《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主要侧重五代而略十国,而杂史、笔记所涉及相关史料反而更为的丰富,但这些文献有不实之处,甚至夹杂着近于神话的传闻。因此,对史料的梳理、甄别是本文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其次,对五代南方士人的定位即评价问题。对于五代士人的评价历来不高,特别是历仕多朝的情况为后世学者所诟病,如欧阳修说:“至于儒者,以仁义忠孝为节,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者,可胜数哉!”欧阳修受其时代价值评判标准的影响,对五代士人的评价很低。本文希望将五代十国士人群体置于五代“季世”的大背景下,对五代士人做一个客观的评价。五代士人历仕多朝的情况,虽有亏传统儒家道德,但这是由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造成的。同时,五代十国士人群体承唐启宋,在历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特别是五代南方士人群体中不乏杰出之士,他们推动了南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两宋时期南方社会经济、文化赶上甚至超过北方奠定了基础。

第一章

五代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发展^①

第一节 南方政局的初步稳定

一、南方地区割据政权的概况

1. 江淮地区的南唐和吴

唐末,占据江淮地区的是淮南节度使高骈,高骈年老昏庸,荒淫奢侈,专用小人,又好长生不老之术,“于府第建别院,院有迎仙楼,延和阁,高八十尺,饰以珠肌,金钿,侍女数百,皆羽衣霓服,和声度曲,拟之钧天。”^②同时又建“左右莫邪都”,挟制诸将。诸将怨恨,渐有叛心,高骈自陷于极端孤立之地。887年,部将毕师铎联合张神剑等发动叛乱,攻陷广陵,囚禁高骈。高骈部将庐州刺史杨行密不服,以救高骈之名,兴兵讨伐,并屡败秦、毕军,包围广陵。城中久困,粮食匮乏,“草根木实皆食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太半;宣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③秦、毕见势不可守,弃广陵逃走,临行前遣人杀了高骈全家。

杨行密攻克广陵后,自称淮南留后。此后,杨行密又联合朱全忠,消灭了孙

① 本章参见陶懋炳著,《五代史略》,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②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二,高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4711。

③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点校,《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北京:中华书局,1956:8363。

儒；在青口大败朱全忠大将杨师厚，使朱全忠无力南下。“行密由是遂保据江淮间，全忠不能与之争。”^①在打败外敌后，行密腾出手，消灭境内武装势力。902年，唐昭宗封其为吴王。吴传五主：太祖杨行密，烈祖杨渥，高宗杨隆演，睿宗杨溥。第三主杨隆演时，政权落入了大将徐温之手。徐温是杨行密旧属，深得杨行密信任，常居府中出谋划策。张顥杀杨渥，徐温本参与其中，而张顥忌之，欲排挤其出外，徐温用严可求之计，以讨叛逆为名，杀张顥，立杨渭为吴王。徐温以镇海节度使、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于升州开幕府，手握兵权，又命其子徐知训等在扬州控制朝政，养子徐知诰驻润州，遥为呼应。吴国内外，悉为徐氏控制。

公元927年，徐温病死。徐知诰囚禁徐温之子徐知询，开始主掌吴政。他仿徐温旧例，自居金陵，其子景通、景迁先后居广陵。公元937年，徐知诰废掉杨溥，自立为帝，国号大齐，建都金陵。不久，又自云乃唐玄宗六子永王瑋后裔，改姓名为李昇，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南唐传三主：烈祖李昇，元宗李璟，后主李煜。李璟在位时，曾先后用兵闽、楚，于945年灭闽，951年灭楚，但由于用人不当，均未能长期统治下去。出兵闽、楚的失利，大大损耗了南唐的国力。在后周的连续进攻下，失去淮南，并向后周称臣。公元958年，北宋灭南唐。

2. 两浙地区的吴越

唐末，管辖两浙的是镇海军节度使周宝，其与高骈同出身神策军，少年时关系很好，及高骈荣显，傲视周宝；双方辖区相邻，又各怀吞噬之计，遂怨隙日深，势同水火。后刘汉宏又进入浙东，使局势越加混乱。公元882年，刘汉宏发兵攻打浙西，周宝两面受敌，于是命杭州八都抗击刘汉宏，八都主将是董昌。董昌命副将钱璆为杭州都知兵马使，迎击刘汉宏部。历经四年苦战，钱璆连破刘部，擒斩刘汉宏，夺取越州。董昌升为越州刺史，占有浙东之地。

浙东甫平，浙西又乱起。周宝统治期间，沉湎酒色，不理政事，大兴土木，横征暴敛，民不堪命。其部将薛郎利用民怨，煽动兵变，焚烧府舍，肆意剽劫，周宝狼狈出逃。周宝败亡后，薛郎自称节度使。钱璆攻伐薛郎，888年，擒斩之；夺取苏、常等州。893年，唐廷授钱璆镇海军节度使。于是，他与董昌、杨行密在江南成对峙

^①（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点校，资治通鉴，卷二六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8511。